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王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任何时代,大学之所以是大学都有赖于我们对大学共同底线的坚守。早期的大学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时至今日,大学已成为整个人类共享的智慧之花。大学的理想在于实现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间的平衡,20世纪研究型大学的兴起破坏了这种平衡,近年来创业型大学的兴起又显示出企业化可能正在突破大学的传统边界。当今时代,理性大学和文化大学已逐渐衰落,以研究型 and 创业型为标志的世界一流大学正成为时代的宠儿。但高等教育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那些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只是政府和企业想要(want)的大学,而非我们需要(need)的大学。我们需要的是致力于人的自由和解放事业,能够培养“好人”的“好大学”。

关键词:大学;研究型大学;创业型大学;好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4)02-0001-09

What Kind of Universities do We Need

WANG Jian-hua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No matter what era we are in, that universities could be called universities is due to our joint effort to stick to the bottom line of universities. As an outcome of human civilization, universities share the same bottom line with human beings. Universities are aiming at the balance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ris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20th century destroyed the internal balance of universities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Recent emergence of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shows that enterprise pattern is challenging the boundary of traditional universities. With the decline of rational and cultural universities, those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marked as research and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the favorite of the times. In practice, the so-called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re what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want, but not ours. What we really need are good universities committed to the human freedom and emancipation as well as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universities; research universities;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good universities

收稿日期:2013-1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BIA110064)

作者简介:王建华(1977-),男,河南息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当今是人类历史上大学最为繁荣的时代,但也可能是大学观念和边界最为模糊的时代。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什么是大学,什么不是大学,不证自明,大学与非大学的边界相对清晰。二战后,随着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大学的数量和类型急剧增多。早期的历史上,大学的同质性很高,学院与大学有着不同的传统和分工。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学院升格为大学以及新大学的不断涌现,学院与大学之间的边界开始模糊,大学内部的异质性也越来越高。今天的大学甚至已逐渐成为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共享的一个好名字。此外,大学在从欧洲传遍世界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于欧洲大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导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大学模式,或不同国家的大学具有不同的文化性格。我们这个时代,多样化已经成为现实,在多样化的名义下,对于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已无人深究,也无法说清。不同国家大学的互认往往是通过政府间或大学间的协议或契约来实现,很多情况下,只能依靠政府的政策文本或大学的规章制度来勉强维持彼此关于大学的共识。但事实上,在同一个大学概念的背后,实质的差异相当明显。在形式多样化的背后,大学理念的碎片化和虚无化已经非常明显。换言之,今天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大学就会立即创造出什么样的大学,而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却始终无人问津。其结果,在教育改革的名义下,为了生存和发展,大学逐渐被设计成为一个混合机构。大学内什么都有,功能上也趋向万能,大学与非大学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随着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对于追求人生意义和美好生活的经典理念的弃守,关于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好大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等逐渐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追问什么是大学意在澄清大学与非大学的界线,明确什么是好大学则是要重温 and 复兴经典大学理念和古典教育哲学,以避免南辕北辙式的错误,而对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的讨论则主要是为了澄清“想要”与“需要”间的巨大差异。大学的发展不能完全被人类或社会的欲望所主导,在实践中我们“想要的”通常并非我们真正“需要的”。虽然从短期利益出发,不能排除我们“想要”的大学也具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但从长期利益着眼,我们更应以人的教育为目的,关注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样的大学。逻辑上,追问“什么是大学”是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的前提,而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的目的则是在于澄清“什么样的大学才是好大学”。

一、什么是大学

在理念层面,“大学”是个高级概念,具有崇高的象征意义。今天作为一种生活常识,大学则近似一种生活的必需品,包裹着大学的都是工业社会的或个人的实用的目的。就像鱼不知水一样,在一般情况下,上大学的人也很少会问什么是大学,也很少有人去思考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大学。即便是对于专业的研究者,大学也是作为已知的研究对象被对象化,而很少去“较真”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学或好大学。作为一种组织机构,现实中的大学好像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所能做的不是去改变大学而是适应大学。但事实上,就像“我是谁”是对于人生意义的终极之问一样,“什么是大学”或“什么是好大学”也是我们对大学的终极之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着我们要什么样的大学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历史上,大学曾尊重常识,坚守传统,大学与非大学的边界相对清晰,大学本身是一个高级概念,在大学之前很少有限定词。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大学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宽泛的二级概念,失去了实质的针对性,大学与非大学的边界开始模糊。当你和别人谈论大学时,必须明确所谈的是哪个大学,何种大学。从最早的法国模式的巴黎大学到后来英国模式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德国模式的柏林大学到美国模式的哈佛大学,大学的模式越来越多样化。今天随着日本和中国等亚洲国家大学的崛起,传统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的大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以美国模式为例,在大学的名称上,从早期的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到后来的前摄大学(Proactive University),再到今天流行的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和企业型大学(Corporate University),大学与市场越走越近;而自从克拉克·克尔创造了多元巨型大学(Multiversity)的概念以后,超级大学(Megaversity)、整体大学(Holiversity)以及万能大学(Omniversity)等单词纷纷出现,源于中世纪的大学(University)的观念正在从字面上被瓦解。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不仅被言词,也被引诱所诱惑”^[1]。其实大学就是大学,如果要区分也只有好大学与不好的大学之分。过多的概念游戏很容易使大学的本质被误解和消解。对于大学,就像其他事物一样,“词是观念的摹本,但是,很容易把词当作观念”^[2]。当然,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无视大学分化和多样化的现实,也不意味着大

学不应该被分类,而是认为无论何种大学都不能突破大学之所以是大学的底线。另外,关于大学的种种概念或理论解释也必须与大学的现实区别开来,绝不能把理论上关于大学的设想或分类当成了大学的现实。

现实中人们对于大学的认知受各种因素影响。空间上,不同国家的人对于什么是大学会有不同的认知;时间上,不同时代的人对于什么是大学也有不同的判断。即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大学也有不同的回答。概括起来,关于大学的观念,既和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有关,也和个体的知识水平、社会阶层与价值取向有关。在那些拥有中世纪大学传统的西方国家(集中于欧洲),大学通常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崇高的象征意义,对于什么机构可以称之为大学通常会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在欧洲很多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学”本身就是一个高贵的词汇。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大学居于金字塔的顶端,只有很少的机构才能称之为大学。在那些没有中世纪大学传统,但同属于基督教文明的新教国家(主要是美国),由于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大学的边界则较为模糊,那里既有最好的大学也有最差的大学,那里的大学既继承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又创造了许多新的大学观念与组织形式。而在欧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大学的观念无一例外是扭曲或混合的。起源上,大学是欧洲文明或基督教文明的产物,除了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知识论或认识论传统以外,后来在西方所兴起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也都在大学这种机构身上打下过深深的烙印。在欧美以外,无论是中东、东亚还是非洲,都有着与西方文明根本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这些国家或地区要么受伊斯兰教影响,要么受佛教影响,要么属于儒家文化圈,其原生态的高等教育机构通常有着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认识论传统和哲学基础。虽然后来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欧洲的大学模式传遍了全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中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被终结,但是欧洲基督教的文明并没有随着殖民地的扩张或语言的入侵而传遍全球,更无法生根发芽。由于文化本身的保守倾向,世界各国虽然拥有了形式上相近的大学,但对于什么是大学的理解却相差甚大。由于文明的冲突和文化的排斥,今天不同的国家很大程度上共享的只是大学的名字与组织形式,至于在名字以及组织形式背后关于什么是大学的观念则根本无法达成共识。因此,今天的大学只能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即便

是在今天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面对的仍是多种大学而不是一种大学。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对于什么是大学的追问都是关于大学的一切观念的原点,也是大学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就像我们对于什么是人的追问会贯穿人类生活的始终一样,只要大学存在,对于什么是大学的形而上的追问也不会停止。现实的世界里,具体的大学可能多姿多态,但在理念的世界里,对于什么是大学总是存在着某种“理想型”。唯一的不同可能在于,在有些时代人们对于什么是大学的分歧不大,这个抽象的问题容易被现实所遮蔽;而在另一些时代,由于大学观念的模糊触及关于大学常识的底线,关于什么是大学的问题则会凸显出来,甚至会成为一个理论的热点。当前由于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社会正逐渐形成,知识经济也方兴未艾,传统大学中衍生出的研究型大学与创业型大学独领风骚;与此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虚拟大学和 MOOCs 迅速崛起,加之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营利性大学和公司大学大量出现,以及在消费社会中各类大学的物欲化和功利主义趋向,诸如什么是大学,大学与非大学的边界逐渐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为了维护大学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合法性,重新定义大学成为了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的诉求。

当然,回答什么是大学,绝非给大学下定义那么简单。围绕在这一看似简单问题背后的是复杂的对于大学的理念之争。虽然有时某种诉求会在竞争中占有优势,但大学既不能忽视任何一方的诉求,也根本不能完全满足任何一方的诉求。对于大学观念的变迁与建构,欧克肖特曾以隐喻的形式进行了生动诠释。如他所言:“许多人经过很长时期曾经建立一座大楼。它的建筑代表许多不同的风格,并与众所周知的建筑规则如此矛盾,以至于被作为奇迹矗立在那里。大楼中的居民是拥有设计方案的鉴定者。有些人甚至声称他们的设计方案就是原来的,因为不管看上去如何,他们相信每座大楼必须有一位建筑师。其他鉴定者则声称自己的设计方案只不过反映了大楼应该的样子。这些设计方案被单独储藏在—间房子内,并且收藏物不断增加,有些还来自遥远的国度。没有任何设计方案与大楼本身具有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大楼的每部分都同样便利,不需要改进,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学会理解和喜欢大楼。有一天大楼里传来‘着火了’的呼喊。鉴定者赶紧保护自己的设计方案,无暇关注大楼本身。然而结果表明实际上是隔壁的面包房着火,浓烟甚过火苗。但面包房的居民逃到了大楼,鉴

定者因此有机会向这些感兴趣的逃难者展示他们的设计方案,因为其他人正在灭火。这些人很容易就相信大楼本身要远比设计方案差,并答应鉴定者帮助他们摧毁大楼(他们总觉得大楼不好看),根据其其中的设计方案进行重建。他们特别赞同的设计方案正是最近从遥远的国度引进的。”^[3]今天由于理念的冲突和利益的纠结,现实中大学的每一位“居民”或“利益相关者”都会对大学充满了“不满的情绪”。实用主义者秉持工具理性,强调大学的社会功用,人文主义者则坚持价值理性,强调大学的人文理念。强调科研的试图把大学变成一个超级实验室或科学帝国,强调教学的则重申人才培养才是大学的第一职能。重视经济效益的认为可以把大学看作知识工厂或专利公司,反对者则认为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损害大学的公共性。激进主义的改革者认为,大学的发展应该与时俱进,无论理念还是制度都必须求“变”,囿于传统会束缚大学发展的可能性,大学的多样化反映了大学改革与发展的勃勃生机。相反,保守主义者则认为,无论如何大学都应有共同的底线。所谓大学,在理念上一定要尽可能地接近于大学的“理想型”,而不是与之相背离。绝不是什么机构都能称之为大学,甚至于称之为大学的也未必真的是大学。大学理念的混乱和组织形式的多样化绝不是一回事。我们可以接受多样化的大学,但绝不能仅仅根据机构的名称来判定其是不是大学。

对于大学观念产生巨大冲击的除了大学本身的变化之外,还有一些外部因素也在左右着人们对什么是大学的理解。历史上,大学里研究的科学化主要是由于近代科学兴起所引发的科学主义思潮所导致的,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将人类所有研究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转化为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研究的科学化既促进了大学的发展,增加了大学的活力,但也导致了人文教育和人文学习的危机。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宣告了科学主义的破产,但大学里科学与研究的关系并没有能够各安其位。近年来“科学自身,也越来越受到各种形式的知识生产的挑战,这些知识生产活动都可用‘研究’这个名目来归类——既蕴含出创新的潜力,同时也对政客和政策制定者们散发着诱人的魅惑”^[4]。如果说科学象征着确定性,研究则意味着不确定性。人类的知识生产在经历了从不确定性向确定性努力的无功而返后,再次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但事实上,知识既不可能是完全确定的,也不可能完全不确定的。换言之,在有些领域的知识是确定的(硬科学),而在有些领域的知识则是不确定的(软科学)。失去了确

定性的科学,那些固守天职意义的科学家将失去得以安身立命的制度性空间。否定了追求不确定性的研究者,人类精神活动的丰富性将会被扼杀,创新的可能性将会枯竭。对于大学而言,科学有科学的方法,研究有研究的逻辑,二者不可偏废。从早期大学里的人文研究,到后来的科学研究,再到今天科学与人文研究在大学里的共存,唯一不变的是大学始终是一个既从事科学和研究工作,又致力于高等教育的机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大学都主要是一个高等教育的机构而不是高深知识的机构。大学是一个研究的场所,但又不同于科学院。大学里需要的是高等教育和科学与研究活动的平衡,而不是学术资本主义(具体地说,又可以分为“科研资本主义”和“教学资本主义”或称“教学创业主义”,前者是指学术研究的商业化而言,后者是指教学主要是本科生教学的商业化而言^[5])或科学帝国主义。

总之,就像人“不能为活着而什么都牺牲掉”^[6],大学也是一样。那么,什么是大学共同的底线或“理想型”呢?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我们,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全在两个东西:一个是高等的教育,一个是高深的研究。一方面大学要提供真正“高等的”教育,以使人成为理性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大学必须开展“高深的”研究,以促进人类精神和社会的进步。与大学相比,传统的学院可以仅仅提供高等教育而不从事任何的研究,而科学院系统则可以仅仅开展科学的研究而不提供任何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只有大学必须既提供高等的教育,又从事高深的研究,而且要保持二者的平衡。总之,大学代表着一类独特的社会组织。这类组织的初衷是为了追寻知识,但知识本身又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其开展高等教育活动的手段或工具。对大学而言,没有高深知识的生产不行,但仅仅有知识生产没有教育行动也不行。虽然高等的教育也在为科学的研究作准备,但高等教育才是大学的最高目标,某种意义上,科学研究只是实现高等教育目的的手段。“大学的设计不是为了生产学者;它的理想不是一个仅有学者居住的世界。”^[7]简言之,与那些专门从事研究的机构相比,大学更接近于一个教化的机构,而与那些专门从事教育的机构相比,大学又接近于一个探究的场所。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就是因为它能在教育和研究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二、对研究型 and 创业型大学的反思

教育和研究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两个必要条

件。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和从事什么样的研究直接决定了大学的精神状况。首先,大学提供什么样的高等教育与大学被定位为什么样的机构密切相关。在德国模式下,大学曾经主要提供学术教育;在英国模式下,大学主要提供的是绅士教育或自由教育;在美国模式下,大学主要提供的是通识教育和学术型的专业教育;而在苏联模式下,大学所提供的则是职业教育或职业型的专业教育。而今天不论在哪个国家,也不论在何种模式下,大学都越来越多地在提供高等职业教育。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原来由非大学类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职业教育纷纷通过专业化的形式涌进大学,说大学教育有沦为职业培训的趋势绝不是危言耸听。在研究方面,不同的时代,大学从事的研究不一样,大学的状态也不一样。因为不同类型的研究直接影响大学的性质和生存状态。中世纪时所谓的大学就是一群人从事“研究”(studium)或“寻求知识”活动的地方。^[8]那时的大学作为行会有职业共同体的性质,具有民间性。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概念和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兴起,大学里的研究逐渐被科学所取代,科学研究或研究的科学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在大学里“现代科学最终被不断细化为分支的学科”^[9],每一个分支学科又都以科学化作为其合法性的来源。最终人类的知识被以科学的名义区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类。对大学而言,这种分类无疑是武断和有害的,不但损害知识的整体性而且改变了大学的性质。这是因为“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人文科学”中的“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也不是同一种“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所以要被冠以“科学”的名称完全是科学主义思潮或意识形态在作祟。理论上,大学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研究,而非科学研究。但随着研究的科学化,在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近代大学里,科学研究的职能被制度化,大学逐渐由职业共同体趋向于一个学科的联邦或科学分支的联盟,其发展的顶点就是20世纪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由于研究型大学对于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各国政府以及企业界对于研究型大学给予了极大关注和大力支持。当前世界各国最想要的大学就是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但事实上,在研究型大学里,科学占据主流,人文主义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研究型大学不再是一个人文学习和自由教育的场所,失去了大学应有的文化底蕴。由于科学的垄断地位,研究型大学打破了大学里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之间微妙的平衡,以致有学者惊呼“教育的终结”,并批评其为“失去灵

魂的卓越”。因此,在人文学习的意义上,我们想要的研究型大学未必是符合我们需要的好大学。从大学到研究型大学,由于科学的强势介入,大学的本质已经发生蜕变。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的区分更是对于大学整体性的破坏或对于大学共同底线的突破。研究型大学不应忽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教学型大学同样也不能不从事研究工作。如果允许甚至鼓励这种“职能分化”或“社会分工”的逻辑在大学场域里蔓延,大学的属性或本质将从根本上被进一步地碎片化或原子化。如果大学的每一种属性或职能都被升格或放大为一种类型的大学,那么在众多类型的大学中,真正的大学将被遗忘。

除研究型大学之外,当前我们想要的另一种大学就是创业型大学(实践中二者有所重叠,有些大学可能既是研究型大学又是创业型大学)。如果说研究型大学未必是好大学,那么我们想要的创业型大学则可能注定不能成为好大学。虽然研究型大学对大学的传统提出了挑战,但研究型大学对大学观念的破坏和冲击远不及创业型大学彻底。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充其量只是打破了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平衡,毕竟教育和研究尚共存于大学之中。而创业型大学则从根本上对于传统的大学观念给予了致命一击。创业型大学里虽仍然保留有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职能,但其使命或旨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像“基督教大学”只有在中世纪的语境中才有意义,“一旦脱离了中世纪,整个关于‘基督教的’学院或者大学的观念就会失去意义。‘基督教’这个术语不能用来谈论大学,正如它不能用来谈论天文台或者实验室一样”^[10],“创业型大学”也只有在企业或市场的语境才能理解。传统上,大学是大学,企业是企业。按企业的逻辑来办大学,或把大学作为企业来办一直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最大的禁忌。这种禁忌就像在现代社会里不能将科学与宗教相联系,不能将国家与教会相联系一样。但在经济正确性的引导下,当前随着营利性大学和企业型大学的兴起,创业型大学迅速成为大学与企业之间的灰色地带。在这个灰色地带里,创业型大学名义是大学,实质上等同于企业或者就是企业。在名义上,创业型大学是以营利为手段,但实质上就是希望大学通过营利自给自足。虽然伯顿·克拉克和埃兹科维兹都曾经对于创业型大学进行过理论和案例的研究,并力陈其创新意义及其对于现代大学转型的重大价值,但事实上,所谓创业型大学仍然还主要是一种学者的话语方式或理论建构,实践中更多的是一些成功的大学被贴上了创业型大学的标签,很难说创业

型大学就是大学范式转型成功的案例,更不意味着所有大学都应办成创业型大学。至少直到今天,创业型大学仍然是一种不成熟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理论,它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产物,反映了大学企业化的某种企图。对大学而言,创业型更多的仍然是一种大学的欲望而非理念。在文化层面上,创业型和大学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巨大的张力。除非有特殊的语境,一般不能用“创业型”来谈论“大学”,就像不能说创业型医院或创业型科学院一样。理论上,说创业型大学和企业型政府一样,更多的是一种隐喻,而不可能是对于大学现实的描述。创业型大学的本质是反大学的,至少和传统上关于大学的概念是很难相容的。“每当这种功利性的目的出现,教育(它关注的是人,而不是功能)都从后门悄无声息地溜走。寻求知识所带来的力量在贪婪的自我中心主义中具有根基,当它以所谓的‘社会目的’出现时,既自私又贪婪,并与大学毫不相干。”^[11]在《知识工厂》一书中,斯坦利·阿罗诺维兹就呼吁“废除企业型大学并创建真正的高等教育”。虽然创业型大学和企业型大学当前在组织形式上稍有不同,但在根本的理念上二者并无差异。

本质上,大学是非营利组织,鼓励大学营利与允许军队经商一样。在这些创业型大学里,企业的逻辑居于主导,无论高等教育还是科学研究都成了营利的手段。除了营利性大学之外,虽然那些创业型大学和企业型大学都反复强调营利不是目的,但手段和目的之间绝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12]现实中,无论营利性大学、创业型大学还是企业型大学,由于利益或其他考量,即便它们能够获得国家在法律层面的合法性,具有大学的身份或资格,但在观念和理念的层面上,它们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很多危险的事物刚开始出现时人们并不会感觉到是一种威胁。近年来,在高等教育市场化大潮中,创业型大学铺天盖地,营利性大学甚嚣尘上,无论学界还是媒体都是支持远多于批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产物。这是因为在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时代里,经济利益和市场法则使得所有的决策和判断都被眼前可见的好处所遮蔽,而忽视了更长远的利益。对于大学的看法同样如此。当代人在乎的永远是能够直接从当代大学的发展中得到什么样即时的好处(比如通过扩招拉动内需,通过市场化减少拨款),至于为了眼前利益可能会给大学本身

或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几乎没有人会在乎。中国大学历史上的院系调整,法国大学历史上的废除大学都是很好的例子。

对于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的批评和反思很容易遭到其支持者的反驳,反驳的理由很可能就是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都发展得很好。的确,今天美国大学执世界大学之牛耳,其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模式为世界各国所效仿。但殊不知,就在外界对于美国以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为代表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一片叫好声中,美国学者对于美国大学的发展早已忧心忡忡。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曾著文质疑哈佛为何忘记了教育的宗旨(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而耶鲁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克龙曼教授则直言大学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面临着“教育的终结”(education's end)。纽约城市大学资深教授斯坦利·阿罗诺维兹则认为,现在的大学已成为知识工厂,高等教育已沦为高级培训。他呼吁,为了实现高等教育的真正目的,要废除企业型大学并创建“真正的高等教育”(true higher learning)。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雷克·博克在《回归大学之道》一书中则坦承:“大学教授们(主要是人文学科的教授们)也纷纷发表文章,对自己所在的大学针砭时弊。以下著作代表了作者们普遍的观点:《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濒临毁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道德沦丧的大学》(The Moral Collapse of the University)、《终身教授中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反智战争》(The War against the Intellect)、《圣殿里的骗子》(Impostors in the Temple)、《扼杀大学灵魂》(Killing the Spirit)。”“这些著作的作者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存在一些共同之处:其一,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指向了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而非所有的本科院校;其二,这些著作都以批判为主要目的,难见对大学和教授歌功颂德的文字;其三,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批判言辞中,有几个共同的话题被反复提及,还引起了读者的共鸣。”^[13]由此可见,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既是大学发展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大学理念遭遇时代挑战最大的时代。由于最新涌现出的各种各样的大学突破了共同的底线,大学正面临着历史上从未要求它进行过的改革。一方面,各种类型的机构纷纷以大学的名义登上了时代的舞台;另一方面,大学内部又在剧烈地分化重组,新的大学和新的系科不断诞生,而教育的职能不断被削弱。这种情况下,现代大学不可避免地迎来

了“废墟”时代。当然,由雷汀斯所提出的所谓“废墟中的大学”既反映了现代大学在观念世界中的混乱,也预示了大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三、我们需要的是好大学

今天的大学是过去两百年来知识大量增长和专业化的结果,这种结果的出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就应该一直如此,也不能决定以后的大学会是什么样子。今天回到过去已不可能,未来大学的出路在于如何超越现在,成功地实现大学的转型,即从争相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走向追求成为一所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强调科研的卓越和对经济的贡献相比,好大学突显了通过高等的教育对于好人的培养。虽然我们不能高估教育对于塑造人的品质和德性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教育可以被视为人类完善自我的一种努力。只要人类存在着,这种努力就不会停止”^[14]。为了避免我们时代在科研卓越的大学里充满平庸的教育,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大学德性的遗失,树立一种追求好大学的理念至关重要。只有在好大学里,人性的塑造才能优先于专业的教育,好人的培养才能超越对专家的训练。当然,好人绝不是仅仅通过好大学就能造就的。除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校教育之外,学校之外的社会教育也必须合乎人的德性。“一只燕子或一个好天气造不成春天,一天的短时间的善也不能使一个人享得福祉。”^[15]一个人只有在一生中都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才能称之为一个好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理念意义上的好人不同于世俗意义上的好人。世俗意义上的好人虽然也包含有道德判断的意味,但此处的“好”是具体的,一般更倾向于“做好事”或“不做坏事”,不涉及德性的完满以及人生的哲学。教育让人成为人,其实质就是造就好人。通过教育才能造就的好人不是指做好事的人而是指合乎道德德性的人。实践中这两者差异很大。做好事是一种行为,由于利他主义是人的本能的一部分,做好事这种行为甚至不需要教育,有时候甚至坏人也会偶尔做好事;与“做好事的人”不同,好人意味着符合道德德性的行动,完全是教育的结果,不存在没有受过教育的好人,也不存在合乎道德德性要求的坏人。一个人之所以做好事,可以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即坏人也可能做好事,从而成为一个做好事的坏人;而好人则不是能够简单地“做”出来的,而且空谈也成不了好人。好人意味着在人的天赋的基础上,通过教育使其道德德性合乎他的自然本性

或天性秩序。

在现代社会,古典意义上的好人传统逐渐被遗忘,媒体的高度发达极大地扩张了人的欲望。在物质主义的社会里,大学的精神性显得不合时宜。历史上,批判精神是大学的重要特质。大学存在的最重要意义就是要对社会进行批判,以保持社会机体的健康。当前大学的批判精神逐渐式微,相反,社会对于大学的批判逐渐兴起。社会批评大学原本无可厚非,批评永远是大学进步的动力,关键是大学要清楚自己的定位并对自己有信心。大学既不能无视批评,也不能接受所有的批评。毕竟有些批评是出于对大学的热爱,而有些批评则只是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每个机构都有其独特的使命,每个机构也都不是万能的,大学也一样,永远无法让所有人满意。但无论如何,社会的欲望不能成为批评大学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改变大学的借口。健康的社会应该发挥大学独特的教育优势,而不能只是迷思于“知识就是力量”。高等教育是大学的命脉,大学不能因为功利主义的目的而随意改变机构自身的根本使命。“大学不能像小游艇一样,在每一瞬间的风动中都被振动。大学要听的批评必须来自那些对寻求知识感兴趣的人,而不是那些因为大学不具有其他不属于自身的东西,而认为大学有缺陷。”^[16]现在的情况是,市场主义主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和灵魂,经济发展的需要高于一切。为了满足社会的目的,大学的功能被重新设计。高等教育改革中,保守主义被激进主义取代,很多原本不属于大学的东西都被以互惠互利的名义塞给了大学。其结果,经过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启蒙”,现代大学已经是一个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自利性机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理念已经如高原上的空气一样稀薄。在市场化的主导下,大学把任何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东西都设定为错误的,相反,为了某种实在的好处它也可以出卖那些与生俱来的权利。“大学不是在教育人,而是训练学生如何更适合填补社会中潜在的空缺。”^[17]大学的使命不再是教给学生人生哲学,而是赋予他谋生的能力,大学教育不再是帮助学生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美好生活,而是挣更多的钱以获得世俗的幸福,大学的存在不再是为人类提供自我完善的场所,而是被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和加油站。总之,大学日益沦为人力资本的提供者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而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所属的世界,也不再致力于培养好人。要克服大学的这种根本的危机,“去除大学现在遭受的‘根深蒂固的无能’,就必须调查大学的整体目的和基础;重新考虑大学的

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大学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的关系”。^[18]否则大学将离生活世界和教育世界越来越远,大学里的教育将逐渐成为物质进步的替代物,而不再关注人到底应该怎样生活,在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吸引下越来越陷入功利主义的深渊。最终传统的大学观念逐渐瓦解,未来或许将没有人知道大学何以以为大学,大学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

当前,虽然知识社会的到来使大学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学在社会中仍然处在边缘或依附的位置,缺乏独立性与自主性。无论对政府还是企业而言,大学依然是一种工具,发展大学或支持大学发展仍然在受一种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哲学的制约。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中,有用性仍然是社会评价大学的核心标准。政府和企业对大学教育的实用性远比精神性更为关注。此外,在世俗的观念里,政府与企业也正在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大学。比如,在组织层面上,现在普遍把大学称为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但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有人把政府或企业称为非学术组织。表面上大学被称为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实质上大学恰恰是越来越接近营利性组织和政府性组织。因为如果大学真的非营利、非政府,这种组织特性原本不用声张。一旦一个组织反复强调某种原本就有的特性,很可能就意味着这种特性的缺失已经近乎不可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社会生活以及学术语言中约定俗成的说法正是大学危机的征兆,因为大学仍然处在一种被支配或附属的地位,而非中心地位。现代社会的法则或秩序仍然是大学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而不是政府、企业为大学的发展服务。当然,有一种观点认为,也许大学原本就不应该谋求这种中心的地位,大学就是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现在所谓的创业型大学就是这种大学观的集中体现。创业型大学集中了政府与企业组织的优势,力图使大学拥有像政府一样强势的行政权力,具备像企业一样超强的营利能力。按照创业型大学的逻辑,一流大学的标准不再只是有原创的科研成果,而且要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还要有明星教授,能在各种排行榜上高居榜首,能成为各种媒体关注的焦点。至于大学内部的思想与文化,大学人的精神活动和道德德性,以及能否培养好人与好公民等则不是现代大学所要考虑的重点。

归根结底,大学的好坏是由大学里的人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大学人,就会有怎样的大学。“大学不是一台机器,用来达到某个特殊目的,产生某种特殊的结果;它是一种人的活动方式。”^[19]但最终什么样

的人能够进入大学又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时代精神状况所决定的。大学始终是社会的“器官”,时代精神像血液一样将大学与社会连在一起。虽然强调科研之于大学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忽视教育的重要性,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大学自身已倾向于将教育的重要性降到最低。最终,有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有什么样的社会需求,就有什么样的大学。今天是一个普遍平庸的时代,科技的发展虽然突飞猛进,但人的精神进步却步履维艰。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日新月异,但思想的创造和道德德性却乏善可陈。在这样的时代,由于缺乏对“好”和“善”的体验,大学教育自然呈现出一种平庸的状态。在追求科研卓越的过程中,大学忘记了教育的宗旨。“灾难不是大学被各种根本不从事教育的人所淹没,而是他们几乎完全摧毁了教育事业。”^[20]由于忽视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大学教育逐渐空心化。由于放弃了成为“好”大学的机会,大学有沦为知识工厂或专利公司的危险。“虽然大学真诚地表示自己首先是人文精神的代表,但是它们的组织形式却与科技社会(technological society)那无止境的需求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21]在高等教育市场化大潮中,随着创业型大学的崛起,学术资本主义给了大学原本就已十分脆弱的人文学习以致命的一击。由于可能丧失人文学习的制度根基,大学自身面临着被重新定义的风险。“如果大学中的学习退化为现在所谓的研究;如果大学的教授变成纯粹的指令和对大学生时间的占用;如果被教授者不再寻求知识财富,而是对此感到筋疲力尽,只希望被提供给有用的道德和知识装备;如果他们不再理解交谈的方式,而只是渴望用来谋生的资格和一纸证书,使他们进入牟利的世界,那么大学将不再存在。”^[22]当前在创业型大学的框架下,所谓卓越大学的标准不再是人的德性的卓越,也不再是文化的魂灵,而是知识的应用价值和学术的生产力。就像现代社会中的人都在追求成为“白富美”和“高富帅”而不再想着通过教育成为一个“好人”一样,现代大学也放弃了对人生意义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成为一所培养好人的好大学不再是大学的理想,失去灵魂的卓越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总之,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好大学,这些都是大学转型过程中亟待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也是最麻烦的。严格来讲,甚至什么是好大学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人对什么是好大学的标准有不同的理解。在世俗的意义上,“好”总是与切身的利益相关。对于什么是好的,评

价总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对于大学而言,好的标准则因时代而不同。总体上,大学可以分为中世纪、近代以及现代三个时期。中世纪的好大学以巴黎大学为范本,近代的好大学以柏林大学为榜样,现代的好大学则奉哈佛大学为圭臬。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和哈佛大学虽然都和高深学问有关,但相对而言,巴黎大学是奥古斯丁意义上的德性的大学,柏林大学是洪堡意义上的国家的大学,而哈佛大学则是弗莱克斯纳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德性的大学所谓“好”的标准是对宗教的忠诚和对道德的坚守,国家的大学所谓“好”的标准是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民族精神的陶铸,而现代大学所谓“好”的标准则是对科学的忠诚和对学术的不懈追求。今天现代大学正处在转型中,由于建立创业型大学的呼声甚嚣尘上,研究型大学对于科学的忠诚正在被创业型大学对于收益的追求所侵蚀,学术资本主义的逻辑正在改变大学的人文性和教育性。经过近千年的积淀,今天关于大学的观念已经纷繁复杂,大学与大学间的区别丝毫不亚于大学与非大学的区别。即便是仅仅在名称上,那些叫大学的机构未必是大学,不叫大学的倒也未必不是大学。这其中既涉及大学的常识,更关乎大学的传统。但无论是常识或是传统,又都有可错性,现在对于什么是大学似乎难有定论,对于什么是好大学更是如此。原因就在于,大学原本是一个教育机构,一个人文学习的地方。但今天科学研究却成了大学的主要职能,大学教师研究高深的学问却并不关注理智德性本身。对于大学教师而言,学术成为一种工具或谋生手段,高深知识的获得只是为了满足一种理性的自负而不是要践行一种理智德性。大学里教师如此,学生也是一样。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有用的知识和实用的技能,很少被要求运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那些根本的问题以形成对人生或生活的整体看法。因为,“只有当教师出于自身的目的真正地关注理智德性本身,而不是屈从于提及它时的自负,理智德性才能被传播。并非野鸭的叫声,而是它的腾起,推动一群野鸭跟它一起飞行”^[23]。对大学而言,积极的教育是必要的,高深知识本身并不会自动转化为高等的教育行动,自然主义的消极教育观不适合于大学,那种幻想学生进入

大学自然而然就会受到高等教育的观念是有害的。“仅仅把一切事情都让给自然去做,毕竟否定教育的本意;这是教育交给环境中的偶然事件。教育过程的进行,不仅需要某种方法,而且需要某种积极的机构,某种行政机关。”^[24]在我们这个时代要避免伴随大学的卓越而来的教育的平庸,必须采取一种积极主义的教育。没有人生来就能成为人,更没有人生来就是好人,人性不会随着时间自然觉醒,人的独特性就在于有学习能力。大学是人的教育的高级阶段(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也是最适合于人文学习的地方。只有那些以教育为业的好大学才能培养出古典意义上的好人,反之也只有那些受过教育的好人才能铸就我们需要的好大学。

参考文献:

- [1][3][7][8][11][16][17][18][19][20][22][23] 迈克尔·欧克肖特. 人文学习之声[M]. 蒂莫西·富勒, 孙磊,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21,165,116,111,117,120,121,127,110,103,121-122,63.
- [2][24] 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 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57,104.
- [4][9] 海尔格·诺沃特尼,彼得·斯科特,迈克尔·吉本斯. 反思科学:不确定时代的知识与公众[M]. 冷民等, 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23,191.
- [5] 张静宁. 美国本科教育中的“教学资本主义”述评[J]. 现代大学教育,2013,(5):87.
- [6][15]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 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0,20.
- [10][21] 乔治·M·马斯登. 美国大学之魂[M]. 徐弢等,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78,421.
- [12] 马丁·路德·金. 维基语录,自由的名人名言[EB/OL]. [2013-11-17]. <http://zh.wikiquote.org/wiki/%E9%A9%AC%E4%B8%81%C2%B7%E8%B7%AF%E5%BE%B7%C2%B7%E9%87%91>.
- [13] 德雷克·博克. 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M]. 侯定凯等, 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 [14] 哈佛委员会.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 李曼丽,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93.

(本文责任编辑 曾甘霖)